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内涵与表征^[*]

张经武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城市文化特色指城市文化的区别性特征,是城市的身份标签和形象证明。“文化特色危机”即这种区别性特征趋弱乃至消逝的危机。“文化特色危机”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城市不可避免的严峻问题,而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危机”问题尤其具有典型意义。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正在经历的“文化特色危机”,其主要表征为文化外观趋同、文化破坏严重、历史文化湮没和民族文化淡化等四个方面。克服“文化特色危机”,说到底就是要做好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保护工作,不仅具有示范性、首位性等独特地域意义,还具有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中国意义。

[关键词]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城镇化;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文化特色保护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11.013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编织起的强大力量对我国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外观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城市个性难辨,城市特色难寻。我国许多城市的面貌正在快速同质化,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旧城改造运动、房地产开发热潮、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以拆旧建新为显著特征的城市建设活动把许多城市都变成了大工地,一些宝贵的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甚至被彻底毁灭。最终一座座新城崛起,一座座旧城倒下。但崛起的新城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城市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现代性面

孔。在这些城市,人们几乎感受不到文化特色。“千城一面”这一短语生动而深刻地折射了我国面临的“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

在我国,对“城市文化特色”及其保护有着自觉思考和相关行动滥觞于近现代时期。一是因为近现代帝国主义侵略毁坏了中国传统城市面貌,大量西式建筑崛起于中国城市。这一城市文化特色被破坏的现实引发了爱国人士的自觉思考与保护行动。二是因为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带回了考古学、建筑学等西学知识,这为相关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智力支持。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社长为朱启钤,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学社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

作者简介:张经武,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传播、电影文化传播等。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研究”(15XSH014)的阶段性成果。

测绘、研究、修缮和保护。营造学社在保护中国古代建筑的同时,其实就是保护了中国的城乡文化特色。在那个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营造学社的骨干梁思成先生忍受着颠沛漂泊之苦,克服重重险阻,在倾尽心力保护中国古建筑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城市文化特色问题的自觉思考。梁思成痛心于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愤恨于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中国城市面貌西化现象,为中国城市建筑应该传承自己的“艺术特性”大声疾呼。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保护中国城市尤其是北京城的古代特色建筑倾尽心力,多次与相关官员据理力争,多次受辱挨斗。在此期间,梁思成多次撰文表达对建筑保护乃至城市特色的思考。在他看来,古建筑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中国城市的特色,这种特色应该在城市建设中积极发扬,“尤其是今天中国的城市都在发展中,对原有的在优良秩序基础上形成的某一城、某一市的特殊风格,都应予以特别重视,以配合新的发展方向。”^[1]他还较早注意到新中国城市建设中面貌雷同的问题,“我们有些住宅区的标准设计,千篇一律到孩子哭着找不到家。”^[2]梁思成的学生兼同事吴良镛传承了他对古建筑的热爱和对保护中国文化传统的热情,吴良镛关注的重点领域正是城市建设与规划。早在1959年,吴良镛就提出了他对中国城市特色问题的真知灼见。他说,“怎样根据各城市的特点创造出其独特的城市建筑面貌,使人一入其境就感到只能是北京,只能是重庆或只能是兰州……,这正是我们所要探讨的。”^[3]1980年,吴良镛在其论文中还涉及了对“千城一面”现象的批判,“城市不问大小,不分性质,一律规划大广场、大马路、一条街,甚至对作为地方标志和骄傲的文物建筑也不加爱护,不是随意拆毁,就是偏偏要在它近旁建造高楼,以比高低。城市面貌千篇一律,抹煞地区差别。”^[4]

1984年,在马尼拉召开的亚洲建筑师协会(Architects Regional Council Asia,简称亚洲建协或ARCASIA)大会上,城市“特色危机”(Identity

Crisis)问题就被重点关注。当时,大家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涉及到城市“文化特色危机”。1989年,吴良镛率先把“特色危机”概念引进著作《广义建筑学》,并关注了中国城市面貌趋同、历史失忆等“文化特色危机”问题。在此书中,他极其敏感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曾几何时,在全国范围的大兴土木之后,惊然发现,‘南方、北方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特色危机’已经在中国出现了。”^[5]随后,在一次美学讲习班上,吴良镛作了《城市特色美的认知》^[6]的专题演讲。吴良镛以敏锐而深刻的思考,从城市“特色危机”出发,从城市文化角度和城市规划角度对“城市特色”作了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构。吴良镛的这次演讲所形成的长篇理论文献,由于时间较早,且表现出专门性、专业性和深刻性,可视作“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研究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在吴良镛那次演讲之后,有一大批中国学者意识到了中国城市面临的“特色危机”问题,纷纷进行相关研究,思考城市特色的概念内涵,寻找如何保护或打造城市文化特色的答案。邹永华、温朝霞、夏固萍等几位学者较早使用“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这一完整概念。邹永华在2002年发表的《当代城市文化特色与城市竞争力》^[7]一文中,第一次将“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这一完整概念写进论文。单霁翔对以“千城一面”为表征的“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给予了较大关注和思考,出版了大量相关学术成果,还结合其本身工作进行了大量呼吁和行动实践。2008年3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他在《文汇报》上亲自撰文《关注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决定性地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千城一面,功能趋同,城市历史记忆消失,城市精神缺失,城市文化特色出现危机”^[8]。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将“城市文化特色危机”作为文章的标题呈现并予以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较多涉及“城市文化特色”主题研究与思考的学者,除了吴良镛、单霁翔以外,还有冯骥才、

张鸿雁、刘士林、张松、胡惠林、鲍宗豪等学者。冯骥才先生知行合一,既撰写文章呼吁,又用实际行动拯救,从城市文化遗产学角度对“城市文化特色”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大量思考与工作。

总体来看,国内已有研究涉及“城市特色”“城市文化特色”的成果较多,但鲜有专门研究“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成果。如果再加上“民族地区中心城市”这一限制性关键词,相关研究成果基本没有。

在西方学界,“城市文化特色危机”主要归属于“城市问题”(Urban Problem 或 City Problem)研究。“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诞生的世界背景就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带来了严重城市问题,其中就包括城市传统面貌的破坏和城市文化的趋同。早在1900年,美国学者霍斯金·阿尔伯特(Hoskin Albert A)在其著作《城市问题》^[9]就注意到了城市文化特色问题;英国著名学者哈孟德夫妇(J. L. Hammond 和 Barbara Hammond)在20世纪初叶也关注到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严重城市问题,其中就包括城市文化趋同和城市身份丧失等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涂尔干(Durkheim, Emile Durkheim)、卢卡奇(Georg Lukacs)、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沙森(Saskia Sassen)、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社会学家在论述社会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文化趋同问题。在城市学领域深有影响的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工业技术带给城市的破坏深恶痛绝,对于“冷酷无情的工业城镇”“病态都市”大加批判,他重视人文因素在城市规划和更新中的作用,重视技术与人文的平衡与协调。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Spatial Production)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Theory of Everyday Life)理论对于分析“城市文化特色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极具启发意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正义”(Space Justice)

理论可以呼应城市文化特色的保护与弘扬。

在西方学界,“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还和“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研究与实践密切相关。简·雅各布斯(Jacobs Jane)的“城市多样性”(Urban Diversity)理论与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City Image)理论可以用来探求“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解决之道。托马斯·舒玛什(Thomas Schumacher)、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罗伯特·斯特恩(R. A. M. Stern)、卡勒恩(Cullen)、阿普尔亚德(Appleyard)、莱昂·克里尔(Leon Krier)等人倡导的“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后现代都市理论既重视传承城市文脉,又重视多样化城市特色的建构,这一理论对于“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倡导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强调城市规划要适应城市历史,要保护历史建筑与景观,^[10]这一主张与“文脉主义”一脉相承,值得“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研究借鉴。

在西方学界尤其是当代研究成果中,“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还涉及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Urban Identity”,这一短语可翻译成“城市特色”“城市身份”“城市认同”“城市形象”等汉语概念。许多西方当代学者倾向于从“Urban Identity”这一角度去研究城市文化特色问题,在具体视角上,又涉及城市旅游、城市营销、城市管理、城市空间、城市正义、城市经济、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创意、社会心理等众多方面。比如凯瑞森(Mark Crinson)的《城市记忆:现代城市的历史与失忆症》^[11],西玛(Sima Y)的《城市入口的城市形象》^[12],布莱恩·埃文斯(Brian Evans)、弗兰克·麦克唐纳(Frank McDonald)、大卫·鲁德林(David Rudlin)三人合著的《城市认同》^[13]还有吉尔·斯图尔特(Jill Steward)、亚历山大·考恩(Alexander Cowan)合著的《城市与感官》^[14]等。

总的说来,西方学界对“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的研究更多是零星或间接的关注,专门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专门针对“民族地区

中心城市”的研究更为稀缺,这和国内研究现状大致类似。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首善城市,城市首位度和中心度最高,这些城市由于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理应更加具备城市文化的特色优势。对于这些城市而言,人们尤其希望在此体验到镀上了“民族风”的独特城市文化。可实际情况是,这种“民族风”的感觉越来越淡。现实情况表明,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比如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等城市,它们同样面临程度不同的“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毫无疑问,“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是值得学界认真研究的紧迫问题,而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危机”问题更具典型意义。本文在梳理“城市文化特色”问题研究学术简史的基础上,试就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内涵与表征进行探讨,并就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试作分析。

二、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内涵

城市的“文化特色”指的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区别性特征,是该城市的身份标签,是该城市的形象证明。“文化特色”反映一座城市文化的本质属性,是该城市文化历史的累积,是该城市文化发生、发展的结果,也是该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显然,“文化特色”如同每一座城市应该倍加珍惜的“身份证”,丢了也就无法证明城市的身份,城市会变成无法被定义的城市。

“危”是会意字,造字之初指人站在高高的悬崖上,恐惧不已,腿都吓弯了。“机”本指弓弩的机关,后引申为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两字合成的“危机”一词其实类似于“困境”或“危境”,强调一种困难危险的状况,也指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在英文中,“危机”对应的“Crisis”最初是医学词汇,指疾病最紧要的转折点,是关乎生死的紧要时刻,后来引申为至关重要决定性的时刻。显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危机本质上是一

种威胁性的形势、情境,或者状态”。^[15]

“文化特色危机”即“文化特色”趋弱乃至消逝的威胁性的形势与状态,它表现为文化趋同、文化失忆、文化失根和文化失魂。“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出现了城市形态趋同、城市文脉断裂、城市记忆消失等城市文化特色的危机。”^[16]这是一种严重的“城市病”,也是一种违背城市建设初衷的“城市异化”。^[17]“城市特色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城市文化功能的受损,而且在深层还意味着城市本身的解体和衰落。”^[18]城市的“文化特色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也是“风险社会”(Risk Society)^[19]正在肆虐的风险,它关乎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未来。

与突发灾难导致的公共安全危机、突发负面新闻导致的政府信任危机显著不同,“文化特色危机”虽然也具有相当紧迫性,但它是城市现代性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其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也相对漫长。另外,“文化特色危机”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随着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发生、发展。

当前,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正在东西南北的各类城市上演,连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也未能幸免。总体看来,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五座代表城市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和拉萨,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文化特色危机”。当我们满怀期待来到这些城市旅行,发现现实中的这些城市离我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当我们从典籍记载中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城市的历史过往,会发现这些城市不应该只是现在的样子。这些城市原本应该具备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特色、地理文化特色和建筑文化特色,原本应该具备比一般城市更强的可感性、可读性、可徜徉性和可意象性。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城市的“文化特色”越来越淡,与国内其他城市并无太多区别,面貌日益雷同。

三、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表征

具体说来,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正在经历

的“文化特色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化外观趋同、文化破坏严重、历史文化湮没和民族文化淡化这四个方面的。

(一)文化外观趋同

城市首先属于地理,它一定坐落在地球上特定的经度和纬度范围,一定处于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城市还属于历史,每座城市不同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它应该有一张个性化的面孔。民族地区中心城市还属于民族,主要民族的大范围高密度聚集决定了它还应有张特殊的民族面孔。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个性化的面孔由地理、历史和民族三个主要因素决定,这三个因素的合力造就了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外观的多样化。但现实是,它们本该多样化的文化面孔正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陷入了“千城一面”的怪圈。

“千城一面”即“千座城市,一副面孔”,它早已经成为反映中国城市主要问题的流行概念。据笔者考证,最早提及“千城一面”的学者是中国社科院的陈栋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面对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些乱象,陈栋生在自己的思考中第一次使用“千城一面”这一短语。他写道:“走出一条‘离农不离产’农村人口就地向城市人口转化的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避免重走工业发达国家‘城市病’的老路。每一城市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市场条件、历史传统,都要有各具特色的若干‘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力避按统一模式,弄成‘千城一面’。”^[20]显然,陈栋生是在城市经济问题层面使用“千城一面”的。如今,“千城一面”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规划、经济、旅游等多层面的突出问题。

文化外观“千城一面”是人们对于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最直观的感受。到过一座城市,就好像到过许多城市;到过许多城市,就好像只去过一座城市。因为它们的文化外观都是一个样,都是一副现代的模样。到处是似曾相识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林荫大道、大型购物中心、连锁店铺。“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马路高架,一样的商场里面卖

着一样的商品,一样的电影院里面放着一样的电影,一样的夜色下闪烁着一样的霓虹灯……,这就是我们过着的一样的城市生活。我们走到这里那里,却总感觉没有走出‘家门口’。”^[21]同样的嘈杂,一样的拥挤,雷同的堵车,明明走在远方却偏偏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正如冯骥才所言,“我们新造出来的城市却像计划经济时代的暖瓶——全国一个样!”^[22]

本来应该最具特色的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同样与其他城市的面貌雷同。“大建高层建筑之风已吹遍全国各地,可是风势如此强劲,居然吹到了远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23]“不少城市在建设中一律实施开发小区模式,一律布置塔式、点式、板式建筑的排列组合,结果造成民族地区城市建筑‘内地化’。”^[24]敕勒川上的呼和浩特商业景象如同广州,壮乡首府南宁的民族大道和深圳的深南大道并无太大区别,雪域高原上的拉萨同样是大面积的现代建筑,回乡银川一直被称为“塞上江南”,其实真的和江南江北的城市长得差不多。“站在乌鲁木齐宽阔的大街上,看着玻璃幕墙的高大华宇及其KPF(国际知名建筑师事务所)风格的帽檐,一时有些恍惚,搞不清是在成都还是在乌鲁木齐。”^[25]

(二)文化破坏严重

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还有城市传统文化历史景观遭遇的轮番破坏。近现代以来,我国大多数城市都遭受过这样几轮共同的文化破坏。第一轮是近现代各种大小战争对城市造成的巨大文化破坏。无论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战争,还是经年累月的内战,中国城市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战争创伤。大量历史景观被夷为平地,大量文物古迹被毁掉或者被掠夺。第二轮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运动造成的文化破坏。所谓“破四旧”,即“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运动中,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文化景观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城市里有点年头的旧物都被当作“四旧”没收或毁坏,连反映城市

历史的许多地名都被强制更改。第三轮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造成的严重文化破坏。快速城镇化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一味追求城市的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再加上土地出让制度和房地产经济等因素,导致我国城市本来已经相当稀少的历史文化古迹、古街、古建筑、特色民居等代表城市文化特色的关键证据变得更加稀少。在旧城改造运动中,在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许多城市传统景观要么彻底消失,要么在荒谬的“建设性破坏”或“保护性破坏”中变得面目全非。

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也都遭遇了这三轮巨大的文化破坏,早已经伤痕累累,目前还像其他城市一样依旧处在第三轮破坏当中。除了这三轮破坏因素以外,还有不少其他因素导致的破坏也触目惊心。比如城市管理、商业开发、盗窃犯罪、游客素质等因素导致的破坏案例也比比皆是。“如西藏拉萨的城市建设,各省市援藏项目使城市建设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热潮,但是众多的援藏项目未能顾及当地的文化特色、尊重拉萨的城市身份,只是简单地把沿海平原的房子样式搬到拉萨,造成原有的城市特色逐渐消失。离开了布达拉宫、八廓街、哲蚌寺、罗布林卡等区域,别的街区和内地城市街区没有什么区别。”^[26]这就是典型的“建设性破坏”,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没有尊重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导致文化破坏。再比如南宁的“三街两巷”文化街区项目,打着的旗号是保护历史街区,结果建成的其实是穿着古装商业地产项目。再比如银川境内的明长城遗迹,一直未得到应有的保护,破坏严重,游客可以随便登临、取土、拍照。2003年中国银川国际摩托车旅游节期间,举办方竟然荒唐至极地安排有在古长城遗址上进行比赛和表演的项目。就在摩托车风驰电掣掀起的尘土飞扬中,古老的长城在哭泣。

另外,像我国其他城市一样,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不仅城市文化特色景观遭遇破坏,城市精神文化传统也遭遇破坏;不仅物质文化遭遇破坏,

非物质文化也遭遇破坏。如壮族节日“三月三”,虽然近几年被列为广西法定假日,每年会举办一些活动,但在首府南宁,在更长时期,这个节日早已经被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节日盖过了风头,许多市民根本就不知道壮族还有这么一个节日。又如蒙古族的“呼麦”是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人在呼和浩特旅行时希望亲耳欣赏这一天籁般的艺术。但这一艺术竟然在我国一度失传,后来派人到蒙古国取经学习,才让这门艺术重新焕发光彩。许多城市的古老技艺,正是因为被破坏到无以为继、濒临灭绝时,才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以保护的。但一旦被列为非遗项目后,削尖脑袋的商家又经常自作聪明地加以开发利用,结果破坏了非遗技艺的原真性,沦为冯骥才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第二轮破坏”。^[27]一旦精明的商家将民族文化和产业相结合,其主要目的一般都是为了商业利润,而不是文化保护。结果看似是文化和产业双赢,其实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破坏。正如美学家曾繁仁在民族地区所观察到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建造了不少民族风情度假村。这是种文化产业,为当地赚了不少钱。将外国的和汉族的游客引进来,唱歌、跳舞,抛绣球、假结婚,住竹楼、土楼。这是一种景观化,实际上,在当地真正的民居被大量破坏之时,风情度假村里出现的是假民居,在真正的民俗已经迅速消亡之时,在度假村里保留的是假民俗。”^[28]

(三)历史文化湮没

每一座城市都是在历史中产生发展,在每一座城市里每天都演绎着人的历史,“城”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城”的历史是城市本身的历史,“人”的历史是与这座城相关的历史。历史不等于文化,但历史构成文化的源头和资源,“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文脉,是城市文化的起点。”^[29]因为每一座城市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城市历史文化就是城市特色文化。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的身份和血统,对于一座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意义重

大。“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是一个悲哀的城市,一个忘记历史的城市,是一个不理智的城市。”^[30]“这些城市绝对引不起你的深思,也引不起你感情的冲动。”^[31]

包括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在内,我国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城市历史文化“湮没无闻”的问题,即重要城市历史文化在当下城市的缺位状态。“湮没”含有“被忽视”“被埋没”之意,“无闻”即没有人知道或者知道的人太少。“湮没”是“无闻”的原因,“无闻”是被“湮没”事物的存在状态。历史文化是一个大仓库,琐碎繁杂,在历史进程中大量历史文化信息被遗忘,少量重要的历史文化被记载,这本身属于人类文化遗忘的规律。少量重要的历史文化被记载,指有文献典籍可查,或有现实的遗迹可作为证据。本应该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城市历史文化一旦在当下“湮没无闻”,这座城市的发展肯定处于病态和危机之中。

城市历史文化的“湮没无闻”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限的历史文化证据没有得到较好对待,淹没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默默无闻。比如王阳明在明嘉靖七年(1528)6月平定“思田之乱”期间,曾至南宁开设敷文书院讲学,影响颇大。由此,王阳明算得上是到过南宁的重要历史文化名人,值得纪念。但现存南宁的相关历史文化遗迹只有两处,而且都湮没无闻。一处是敷文书院旧址,在南宁市北宁路与共和路交汇处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储备局宿舍,但老的书院建筑早就不存在,甚至连何时被毁都没有文献记载。只剩广西壮族自治区储备局宿舍大门口右边尚有“王文成公讲学处”石碑一块,这块石碑被嵌入了旁边建筑物的外墙,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何时所立也无文字记载。另一处是位于人民公园镇宁炮台的王阳明遗像石碑,画像腐蚀严重,已经看不清楚。它被混放在其他石碑之中,一般游客游览至此根本不知道那里有块石碑是纪念王阳明的。

第二种情况是,在现实城市中看不到某一重

要历史文化资源的任何物质证据和纪念设施。比如南宁东北角本来有一座文化名山——马退山,这座山一直作为南宁重要的地理标志出现在古代志书或城市地图中。柳宗元遭贬广西柳州期间,还曾来此山游历,留下了散文名篇《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提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著名美学观点。就是这样一座有唐代大文豪以文学铭记的历史文化名山,不知何时竟然完全消失在南宁的地图和现实中。至今连其具体方位都难以搞清楚,更不要说有什么纪念设施了。

第三种情况是,该城市许多市民不知晓应该知晓的属于这座城市的重要历史文化常识。比如宋代名将狄青曾经南征邕州,平定壮族首领侬智高反宋起义。狄青率领将士在南宁及周边征战近一年时间,这是发生在南宁这块土地上的著名历史事件,狄青也算是南宁历史文化名人。狄青北归后,留下了大量汉族将士屯守于邕州城郊,后来这些将士及其后代慢慢本土化为当地农民。以这些来自北方的汉族将士方言作为基础,融进本土少数民族方言,慢慢形成了著名的南宁本土语言——平话。狄青平定侬智高“大南国”的军队叫“平南军”,所以屯守将士的聚居地被称作“平南村”。因为这一方言以屯守将士聚居的平南村为发源,所以简称“平话”。至今广西平话人口达到500万左右。^[32]应该说,狄青和平话都是南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南宁市民对它们的认知极为有限。据本课题组街头口头采访调查,在回答“您知道狄青与南宁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时,竟然有高达82%的市民回答“不知道”;在回答“您知道南宁平话是怎么来的”这一问题时,78%的市民回答“不太清楚”,33%的市民甚至连“平话”是什么都没听说过。再比如,据街头采访调查,呼和浩特市市民对“赵北长城”的历史文化常识不知晓率高达85%,乌鲁木齐市民对毛泽民相关历史史实的不知晓率高达66%,拉萨市民对“拉萨”城市名称来历常识的不知晓率高达75%,银川市市民对有着“清初第一良将”之称的赵良诚不知晓率高达90%。以

上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相关重要历史文化常识并不被市民充分知晓。

(四)民族文化淡化

民族文化淡化,指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民族文化特色感趋弱的问题。许多人都有对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民族文化特色的期待落空的体验。原以为这些城市到处都是民族风情,不远千里去体验,结果发现民族文化打着灯笼难寻。对于壮乡首府南宁,许多人的期待是,身处南宁街头,到处可见壮族服饰,耳畔飘来“刘三姐”那样的歌声,民族建筑也随处可见,还可以吃到正宗的壮族特色美食。可真正到了南宁,许多人大失所望,发现这座城市与自己曾经去过的大多数城市如出一辙。穿着壮族服饰、唱着山歌的“刘三姐”和“阿牛哥”似乎根本不存在,壮锦、铜鼓、蛙图腾、五色糯米饭等壮族文化特色的其他方面也很难获得体验。对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许多人的期待是能够较容易体验到马文化、蒙古包文化、成吉思汗文化、蒙古音乐文化、草原食品文化等民族文化特色。但真正到了呼和浩特,大家的普遍感受是,除了牛肉干和奶制品等蒙古族食品文化能够体会到,其他方面也很难形成鲜明印象。就连呼和浩特的许多城市广场,与内地设计也无明显区别。银川和乌鲁木齐,民族服饰文化特色倒是保留了一些,尤其是随处可见穆斯林妇女的“盖头”和男子的“礼拜帽”,但这两座城市在民族建筑、民族活动、民族工艺等方面的文化特色也不太明显。拉萨的藏族宗教和藏族建筑文化特色保持得相对较好,但是在藏族服饰、藏族工艺和藏族饮食方面的特色不太明显,藏族建筑也面临着被雷同化现代建筑包围的危机。

民族文化淡化体现了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的理想与现实、应该与不该、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矛盾。在市民心中,民族文化特色代表所在城市的身份标签和文化自信。在游客心中,民族文化特色是行前的审美期待,是期待视野中朝圣般的感受。这一特色一旦消失和淡化,市民的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会一起暗淡,游客的期

待落空感会无比强烈。

四、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和首善城市,作为备受关注的少数民族聚居城市,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意味着各方面社会风险及危害性影响的存在,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保护工作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一)中心城市的示范性影响

中心城市是城镇体系的核心,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效应。对于所在区域而言,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不仅是行政的中心,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心城市对区域内的非中心城市具有显著的示范性影响,中心城市的发展情形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非中心城市的贡献,中心城市的好与坏就像投入水中的石块,其影响会波及辐射至非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是整个区域形象的代表,它聚集了区域的各种资源包括文化资源。就文化领域而言,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除了代表中心城市本身,还代表了区域内的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展示和传播的特色文化有一部分就来自于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没有得到较好保护,也代表了非中心城市文化特色的保护情况不够理想。

中心城市的示范性影响还体现为发散性和辐射性影响,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危机会随着中心城市对周边的强大影响波及非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文化生产与服务的设计和运营主体大部分直接来自于区域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是一个班底。比如房地产小区设计直接由中心城市照搬到非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民族街区设计直接复制中心城市原稿,非中心城市某旅游景点的开发完全交给了中心城市某文化传播公司。如此现实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在许多方面变得雷同,连城市文化特色危机也如出一辙。

(二) 首府城市的首位效应

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主要涉及南宁、呼和浩特、银川、拉萨、乌鲁木齐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它们是首府城市,也是所在民族自治区的首善城市和首位城市。它们都具备首位效应,是区域内首屈一指的城市,是区域内综合发展实力排名第一的城市,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区域范围内的首善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首先要搞好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要走在区域内城市前列,城市建设成就就要超过区域内所有其他城市。由此,我国区域内首善城市的建设往往不惜举全省之力,举全区之力,整个区域内的各类资源都优先服务于首善城市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如果首善城市的文化建设结果是产生了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这不仅意味着“文化首善”目标的落空,也给区域内非中心城市树立了坏典型。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还是区域范围内的首位城市,即第一重要的城市。因为它们最重要,所以在区域内外具有最大影响力,这就是一种“首位效应”。这种“首位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首位城市是区域内的火车头、龙头和领头雁,其各方面工作能够带动其他城市。其次,首位城市是整个区域的脸面、门面和形象代言,其整体形象尤其是城市文化形象不仅代表相关城市,还代表区域内所有城市。第三,首位城市是整个区域对外传播、外向竞争的主要担当者,只要首位城市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寂寂无名,那么整个区域在全国和国际上也排不上名号。因为以上三个方面的“首位效应”,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城市文化形象变得异常重要,至少要站在城市本身、所在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去思考。相关城市如果出现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其危害性会因“首位效应”波及到不同层面。

(三)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保护的中国意义

民族地区早已从对外开放的大后方,变成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国际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南宁、呼和浩特、银川、拉萨、乌鲁木齐五座城市都处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搞好这些西部主要城市的各方面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民族工作,关系到全国大局。这些城市还一直是国际游客、西方政客、西方媒体关注的重点,城市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关联到中国的国家形象。由此,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各项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中国意义。从城市文化角度去分析这种中国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中国政府民族工作的观察窗口。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管理的中枢和核心地带,是我国政府民族工作的重点区域。民族政策是否落实到位,民族治理是否高效,民族团结是否深入,民族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民族信仰是否得到尊重,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管中窥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否具备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是衡量城市民族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体现中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典型场所。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今天各民族群众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照解放前,各民族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正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走向繁荣。但是,一些西方媒体和心怀叵测的政客对我国民族地区事务一直抱有偏见,不断发表种种污名化言论。回击这些恶毒言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好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中心城市,让美好幸福的城市生活、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在这些城市得以充分体现。在这些城市传承和保护好优秀民族文化,就是展现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前提。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形象代言。各民族优秀民族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中华民族

共同体文化的同时,积极传承和保护优秀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特色内涵,这其实就是在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对于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传统文化保护寄予厚望,对这些城市鲜明的城市文化特色寄予厚望,期待在民族地区中心城市能体验到中国城市的民族文化特色。由此,强化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民族文化特色,避免陷入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中国城市文明建设成果的关键展示地。中国城市文明建设成果不仅体现在中东部的一线城市和核心城市,也体现在西部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后者的意义更为关键。只有西部相对欠发达城市也获得了充分发展,展现出良好面貌,体现出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我们才能自豪地说中华民族真正迎来了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些城市的民族特色文化是否得到保护和弘扬,是衡量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尺。经济发展了,文化却褪色了,那不是真正的城市文明。只有现代化的雷同景观,充满民族特色的城市风物不见了,那也不是我们所要的城市文明。

五、结 语

城市文化特色指的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区别性特征,是该城市的身份标签,是该城市的形象证明。“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即这种区别性特征趋弱乃至消逝的危机,它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部门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是值得学界认真研究的紧迫问题,而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文化特色危机”问题尤其具有典型意义。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正在经历的“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其主要表征为文化外观趋同、文化破坏严重、历史文化湮没和民族文化淡化等四个方面。克服“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说到底就是要做好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具有示范效应。作为首位城市,民

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具有首位效应。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窗口,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还具有重要的中国意义。

中共中央在2014年5月26日召开了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反复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党章。无论是“互嵌式结构”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些理论与相关实践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而不是削弱民族文化差别。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并不排斥“各民族个体文化”,两者之间是“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所谓“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所代表的“爱国团结”的共同文化诉求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文化形式。所谓“多元”,就是“各民族个体文化”的丰富多彩、美美与共。在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中心城市,首先要认同和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同时也要尊重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要致力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各民族个体文化”的和谐共生。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这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重要建议,它针对的就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某些“以物为本”“以政绩为本”“以GDP为本”的错误倾向,针对的就是我国许多城市正在发生的“千城一面”式的“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提法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我国大多数城市雷同面貌的现实观察,基于广大市民和游客对某座城市基本一致的客观

感受,是基于研究者对相关城市文化传统与现实进行深入田野考察和对比研究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明确“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内涵与表征,梳理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工作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对于做好相关研究以及解决现实问题都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积极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实事求是,正视问题,积极作为。大力强化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工作,努力克服“千城一面”的“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向着“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踏实前进。

注释:

[1]梁思成:《梁思成文集4》,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86页。

[2]梁思成:《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北京规划建设》2001年第3期。

[3]吴良镛、汪坦:《关于建筑的艺术问题的几点意见》,《建筑学报》1959年第7期。

[4]吴良镛:《研究国情,了解世界,探讨规律》,《世界建筑》1980年第1期。

[5]吴良镛:《广义建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

[6]吴良镛:《观念与意识:城市特色美的认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环境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7]邹永华:《当代城市文化特色与城市竞争力》,《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IFHP)第46届世界大会中方论文集》,北京: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2002年,第140-143页。

[8]单霁翔:《关注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问题》,《文汇报》2008年3月8日。

[9]Hoskin Albert A., *The City Problem*,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10]张松:《新都市主义宪章》,《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95页。

[11]Mark Crinson, *Urban Memory: History and Amnesia in the Modern Ci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12]Sima Y., “Urban Identity in the Entrance of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3(04).

[13]Brian Evans, Frank McDonald, David Rudlin, *Urban Identity*,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4.

[14]Jill Steward, Alexander Cowan, *The City and the Senses: Urban Culture since 1500*,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16.

[15]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6]文明城市长效机制研究课题组:《文明城市与文化发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7]张经武:《城市异化与城市美的思索》,《现代城市研究》2004年第10期。

[18]刘士林:《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0]陈栋生:《工业布局调整方向与途径的探讨》,《经济问题》1983年第5期。

[21]倪毅:《新型城市化拒绝特色危机》,《浙江经济》2012年第11期。

[22]冯骥才:《我忧城市雷同》,《建筑装饰材料世界》2004年第1期。

[23]张开济:《城市现代化≠建筑高层化+玻璃幕墙》,洪再生、高志主编:《建筑评论》(第1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

[24]单霁翔:《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1页。

[25][26]孙俊桥:《城市建筑艺术的新文脉主义走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27]周润健:《冯骥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第二轮破坏》,《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6月21日。

[28]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主编:《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下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29]陈柳钦:《“钦点”城市》(一),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30]许庆福、于学峰、毛美桥等:《城乡一体化发展下的区域土地整治研究》,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

[31][法]阿尔贝·加缪:《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加缪全集》(第6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60页。

[32]袁少芬:《袁少芬集》,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57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